『后真相』的『迷与思』

【编者按】

马克·吐温当年愤世嫉俗地说“真相还没穿上靴子，谎言已跑遍半个世界”，而在智能手机和网络普及的时代，有时真相还没伸脚穿袜子，谎言已跑遍整个地球。

我们当前所处的信息爆炸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原子化的特征。互联网高速公路也不时让谎言高速传播，并呈现出真相的样子。另一方面，随着传统主流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话语权的“旁落”，人们对于同一新闻事件，通过多重渠道展现出的几张面孔，显得无所适从、莫衷一是，这就是所谓新闻的“后真相”时代。

信息爆炸也带来了谣言的爆炸，然而，人类的大脑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传统的处理信息方式，因此部分受众更容易被耸人听闻的“标题党”所吸引。因此，学会甄别信息的真伪，在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不断提高“媒商”，不犯懒、不盲从，勤思考、勤核实、勤较真，无疑是甄别虚假信息，提高有效获取高价值信息能力的不二法宝。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或许深陷“后真相”迷雾，而无从求解。作为肩负重任的新闻舆论工作者，却不能“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想办法找到冲出迷雾见青天的路径，负起应有的责任。

第 40 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邀请新华社记者、传播学学者分析“后真相”的迷与思，并试图探求应对之策。

策划：易艳刚 刘晶瑶

漫画：曹一

冲破“迷雾”有良方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后真相’展现了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新闻信息的碎片化创造了一个原子型的世界，谎话、流言、绯闻在其中高速传播。谎言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并呈现出真相的样子，相较于主流媒体的信息，网民们更愿意相信彼此。”这段话由《全媒派》编译自《经济学人》发布的一篇文章《Art of the lie》，讲述“后真相社会”，引发社交时代共鸣。

我们是否身处于“后真相”之中呢？曾几何时，人们身边的新闻事件多以单线程发展的状态呈现，就像程序执行时，所走的程序路径按照连续顺序排下来，前面的必须处理好，后面的才会执行。彼时围观的群众也像一心一意、用情专一的痴情少年，耐心等待着事件新的进展，直到水落石出、尘埃落定。可伴随着网络时代信息爆炸式发展，人们的表达欲被手指轻点就能实现的快捷全面激发。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或许深陷“后真相”迷雾，而无从求解。但作为时代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的新闻舆论工作，以及肩负重任的新闻舆论工作者，却不能“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想办法找到冲出迷雾见青天的路径。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源，更易激动和满溢的民众情绪，新闻舆论工作者如何能做到“常在河边走却能鞋不湿”呢？走转该求真较真，时刻不忘新闻媒体身为党和人民喉舌的职责，才是不二良方。

冲破“后真相”迷雾，看起来不易，实践起来更是有赖于新闻舆论工作者的高度自律。一方面，当媒体发展格局进入自媒体蓬勃旺盛的时代，一些媒体从业者在众声喧哗中对“热点”不辨真假，不少公号都在事件一冒头的时候就赶紧“攒文”发声，甚至制造出大量对受众无益、甚至是混淆视听的垃圾新闻出来。多一分审慎，多一分对新闻职业的尊重，多一分对“铁肩担道义”的执着，才可能避免趟入“后真相”的浑水，才能给受众带去更多有价值、有内容的新闻产品。

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掌握舆论主动权的责任感，积极有效推进媒体融合，以真理真相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冲破“后真相”迷雾。

“点击转发”时代，如何对抗谣言

方可成

去年的一场美国大选，一路走来，与谣言、阴谋论、假新闻相伴，也让人们围绕数字媒体时代的谣言与真相，展开了热烈讨论。

其实，这一切并不是从未有过的新现象。

新闻的历史有多长，假新闻的历史就有多长。早期的报纸，并没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客观真实”等原则，他们发布的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从未间断。

政客撒谎更不是新鲜事。太远的就不说了，尼克松在“水门事件”期间曾信誓旦旦地说“我不是骗子”，最终却因为撒谎而下台；比尔·克林顿否认与莱温斯基的关系，同样是赤裸裸的谎言。

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所见到的谎言横行，确实有新鲜的元素。比如，造谣门槛低了，无须办一份报纸也能制造假新闻；再比如，传播谣言也变得更容易，不过是动动手指点击“转发”就可以。

谣言丛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曾经乐观地认为，信息爆炸意味着人类可以获取的知识变得无穷无尽，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然而，事实却有些残酷——信息爆炸带来的后果，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变得博学、智慧，而可能是谣言爆炸、垃圾信息爆炸。

这是为什么？答案的关键，在人类的大脑。

生物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人类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类的大脑至今仍然保留着适用于远古时代生存的特质。比如，对危险特别警惕，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这种在原始社会非常有用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并不全然适用，而且会被精明的谣言传播者利用，制造出各种诸如“震惊”“不看这条会后悔”的恐吓型标题。

同样，我们的大脑能处理的信息量，依然是信息革命之前的水平。虽然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度突飞猛进，但人类获取信息、分析信息的速度，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如今信息的确变多了，但人类的大脑处理不过来。

信息处理不过来，怎么办？人类的大脑会用一些花招来应付，比如重点选择一些信息，忽略其他信息。举个例子，我们更容易注意到已经存在于记忆里的东西（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容易忽略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们更容易注意到反常、奇怪、有趣、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会轻易被标题党吸引）；我们更容易注意到发生了变化的东西（更容易看到相对变化值，而不是绝对值）；我们更容易注意到那些和自己的既有观点相符的细节（也就更容易忽略不一样的看法）；我们更容易注意到他人的问题，而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

所有这些，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偏见”。适度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存活，免于被过多信息压垮，而当信息爆炸增长，大脑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时，人类也就更容易产生偏见，更容易被谣言误导，在扑面而来的假新闻面前手足无措。

信息过载的年代，由于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一些人掌握的信息总量非但并没有增长，获取垃圾信息、虚假信息占的比例反而增长了。信息革命带来的这种“副产品”，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指望人类的大脑在一夜之间进化到适宜于信息时代，显然不可能。在这个时代，要想从根本上扼制谣言和假新闻的传播，只能依靠我们每个人主动对抗大脑在信息压力之下爆发出来的偏见。

对抗的方法大致有两个：一是更多地掌握使用外部工具的方法，让越来越智能的机器来帮助我们处理信息，抵抗信息爆炸的压力；二是在社会上进行信息素养的普及教育，让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可能存在的偏见，都学会不受偏见影响地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输出信息的方法。

（作者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

提高“媒商”，拒做假新闻“二传手”

明金维

“刷屏时代”，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微信群里，经常流传着各种真假莫辨的信息。有点可笑，也有点可悲的是，虚假信息总是能“骗到”一部分人。

我们必须承认，移动互联网、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出现，让炮制假新闻的门槛大大降低；同时，借助分享、转发和群发，假新闻的传播效率也大大提升。

在人类历史上，虽然从来不缺乏似是而非的阴谋论和各种谣言，但“假新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如此广泛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是新闻业高度发达的一些国家，社交媒体也是各种假新闻满天飞，让很多人担忧不已。

假新闻的诞生，有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都跟人性的弱点有关。有人炮制假新闻，只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刷一下存在感；有的人则是为打造所谓的自媒体“爆款文章”，吸引眼球，进而通过广告实现商业变现；还有的人则是别有用心，企图趁乱浑水摸鱼。如果不加甄别，以讹传讹，就会成为假新闻的“二传手”。

当然，也有一些不太靠谱的媒体，通过移花接木、东拼西凑，炮制大量误导性假新闻。

在这样一个假新闻满天飞的年代，人们如何做才能免受其害？答案是提高我们的“媒商”（Media IQ）。这个词指的是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一个人甄别虚假信息、有效获取高价值信息的能力。如何提高我们的“媒商”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怀疑精神。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下，某些越是看起来耸人听闻、让你热血沸腾的“新闻”，越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炮制出来的假新闻。

以前我们常说白纸黑字假不了，但现在这个年代，在网络上炮制一条假新闻，实在太简单。如果缺乏怀疑精神，对各种新闻信息照单全收，我们最后只会沦落为一个不断被假新闻诱骗的笑料。

第二，提高“媒商”还需要“三看”。在信息爆炸年代，我们迫切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看到一条轰动性的新闻，首先不要去转发，而是先“三看”：

一看信源。就是看新闻的源头是哪里，判断一下信源的可信度是高还是低。相对来说，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远比一些小道消息可信度高；而一个从前令人闻所未闻的媒体，如果突然爆出了什么惊天内幕，不靠谱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长。

二看其他媒体有没有跟进报道。通常来说，真正的大新闻，一旦爆出，主流媒体都会纷纷跟进。如果没有其他媒体跟进，孤立信源的大新闻，就很可能是假新闻。

三看相关新闻是否已被辟谣。现在很多假新闻都是沉渣泛起，其实早就有靠谱的媒体辟过谣。看到轰动性的新闻，建议先用关键词去搜索一下，如果已经被辟谣过，就不要再去当可笑的“二传手”了。

很多时候，那些充当假新闻“二传手”的人，不是太笨，而是太懒。懒得思考，懒得判断，懒得核实，懒得较真。在自媒体时代，只要不犯懒，多一个心眼，很多假新闻还是比较容易甄别的。

识别假新闻，或不被那些灰色地带的误导性信息所惑，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常识以及分析和思考的体系。而且，养成怀疑、验证的信息接收习惯，也非常重要。

今天甄别信息甚至比获取信息变得更加重要。一个不懂得有效获取高价值信息、甄别信息的人，最后可能会淹没在大量虚假、误导性信息当中不能自拔。

提高“媒商”，请从今天做起。

善用『记忆研究』成果，有的放矢遏制谣言

Laura Spinney

在“后真相”时代，研究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再次凸显。记忆的不可靠性已是众所周知，但一些专家担忧一种新的现象正在涌现。**“通过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站点，记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群体之间分享，模糊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界限”**，哈佛大学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 Daniel Schacter 说。“基于互联网的假信息传播，比如最近被广泛公开的假新闻站点，可能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扭曲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构成了历史的基础，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思考。**研究表明，社交网络会强有力地塑造记忆，人们不需要多少暗示就会服从主流记忆——即使那是错的。**不过，并非所有发现都是悲观的。这项研究也指出消除错误记忆或在一开始就防止其形成的方法。

一个群体所保存的一系列集体记忆，显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原因之一是人们一般受少年或青年时期发生的事件影响最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记忆突点”。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发生在他们青年时期的事件会覆盖此前主导社会的事件，从而“更新”集体记忆。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代人在记住一些事件的同时，也会忘却另一些事件。例如，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 Henry Roediger 和心理科学学会的心理学家 Andrew DeSoto 报告表示，一代代的美国人有规律地遗忘过去的总统，这种规律可以用一个幂函数表示。根据他们的预测，杜鲁门（1945 年–1953 年担任美国总统）将在 2040 年被遗忘，就像今天的人们已遗忘威廉·麦金利（1897 年–1901 年）一样。

2015 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 Alin Coman 发布报告称，记忆趋同发生在社会群体内部的可能性大于社会群体之间。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因为已有调查数据表明，62% 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在社交媒体中一般存在着明显而强大的群体划分。去年，他的小组首次研究了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如何在较大的群体中影响集体记忆形成的。在实验室中，Coman 可以操控社会网络，并考察由此形成的记忆。

他发现了“弱连接”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提醒人们在记忆趋同过程被消除的信息或许是弱连接的功能之一。但时机也具有重要作用。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Coman 发现如果弱连接在网络成员互相讨论前提供了信息，那么该信息将更有可能塑造他们的集体记忆。根据他的发现，Coman 提出了建议。例如关于紧急情况下（如发生流行病）**如何向大众传播关键信息的。他向政府官员提出了一些建议：起草一份简明扼要的要点清单，确保所有官员采用同一清单，经常重复这些要点，并密切监视流传中的有害信息。**

举例来说，在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一条错误信息就增加了美国人的恐慌：与埃博拉感染者同处一室就能被感染。Coman 说，终结谣言的最佳方法，应该是经常解释埃博拉只能通过体液传播。“如果知道错误信息的性质，你只需提起在概念上与之相关，但事实准确的信息，就能有的放矢地遏制它”。

集体记忆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有人会利用它来误导他人。“信息在社会中的自由传播一直被视为开放的现代社会最重要、也是最具建设性的特征之一，”Coman 说，“但是，建设这样的社会并不能保证正面的结果。”但如果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当人们再次听说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大屠杀时，这样的知识或许就能为他们提供某种防御。

——本文摘自微信公号“Nature 自然科研”（ID：macmillan-nature），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并授权

清除雾障：“后真相”时代记者的责任

徐剑梅

近日，经由一些中文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的传播，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出生地问题，在国内网络上又成为一个小小热点。

这事儿看上去有鼻子有眼，新闻要素一应俱全：有明确消息源和发布时间地点——奥巴马的异母哥哥马立克·奥巴马 3 月 9 日推特发布；有图片证据——英属肯尼亚蒙巴萨沿海省总医院 1961 年 8 月出具的出生证明，上面还印着一只黑色小脚丫；有新闻背景——美国关于奥巴马出生地的争论持续多年，据说去年底美国某县警长经 5 年调查证明奥巴马的夏威夷出生证系伪造……

真相呢？其实这张图片最早出现于 2009 年，当时曾被人拿来在网上拍卖，随即被多方调查证实为伪造。证据包括：年月日顺序是美式而非英式写法；当时肯尼亚没有“沿海省”一词；1963 年肯尼亚独立前，蒙巴萨为英属桑给巴尔（现坦桑尼亚境内）一部分；出生证上写的医生从未在蒙巴萨任何医院工作过；当时肯尼亚人的出生证没有婴儿脚丫印……

至于爆料人，虽是奥巴马异母哥哥（老奥巴马和第一任妻子的长子，生于 1958 年），但近年两人关系恶劣，去年美国大选时曾公开支持特朗普，并发推称特朗普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摇滚巨星猫王转世。他还曾应特朗普之邀，参加去年 10 月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三次电视辩论。顺便说一下，此人接受媒体采访是明码标价收费的，还创办了“巴拉克·H·奥巴马基金会”全球募款，说是以父亲名字命名，但老奥巴马和他异母弟弟三节名字都一模一样。

再查查这位“异母哥”曝料史，原来他在 2015 年 4 月还曝过另一桩“猛料”——他和时任总统奥巴马可能既异母也异父。他说，他的异母弟模样不像老奥巴马，却很像被美国右翼怀疑为共产党的非裔美国人弗兰克·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1906–1987）。

事实上，美国网络上多年来流传着关于奥巴马的三种说法，即“奥巴马非美国出生”（因而按美国宪法无资格当总统）“奥巴马真爸爸是共产党”“奥巴马是穆斯林”。**这些年，这些说法反复被证伪，却一直在流传。**去年 9 月，最著名的奥巴马出生地质疑者、如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承认“奥巴马总统出生在美国”。但现在看来，奥巴马的出生地问题争议，仍然没有消停。

回归本文开头提到的记者报道，一篇国际新闻报道有“言”即录、要素齐全、消息源明确，是否就不算假新闻呢？为吸引更多人关注，把标题做得耸人听闻一些，再打上万能的问号，即便内容不实，是否就可以免责呢？

其实，马立克提供的肯尼亚出生证和去年底某警长称奥巴马夏威夷出生证造假，都是旧闻，在网上搜一下就不难找到证伪报道。照译照转当事人的“言“，却不说明消息源可靠性和事实核查情况，这样的报道恪守新闻规范吗？至于那种新媒体范儿的结束语——“奥巴马的兄弟……这样出来搞事情，真的好吗？”真的很想说，谁出来不要紧，搞不搞事情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事情是不是事实。媒体不查核、甄别、判断，就跟风报道，真的好吗？

身处社交媒体时代，“后真相”大行其道，假新闻风生水起。在传播能力上，真相似乎总是处于下风。这首先是因为，核查事实需要时间。马克·吐温当年愤世嫉俗地说“真相还没穿上靴子，谎言已跑遍半个世界”，而在智能手机和网络普及的时代，真相还没伸脚穿袜子，谎言已跑遍整个地球；其次是因为媒体门槛越来越低，大量自媒体和网红的声音日益强大。往好里说，主流媒体不能再垄断话语权；往糟里说，争抢点击率的后果，使劣币更容易驱逐良币；再次，政治观点趋于极化，真相与观点日益混淆。当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争夺话语权的战场，只问立场，不问真假，结果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第四，制造假新闻成本低，收益高。假新闻不仅是操纵舆论、煽动情感的利器，也是一门牟取暴利的生意。尝到甜头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很小。

眼下，在假新闻问题上，有两大悬念令世界瞩目。一是特朗普与《纽约时报》等部分美国主流媒体的“持久战”谁胜谁负。入主白宫两个多月来，特朗普不断指责这些主流媒体是“假新闻媒体”“美国人民的敌人”，声称自己在“打击虚假信息”，而后者则指责特朗普本人就是虚假信息源之一。这场激烈的媒体大战，催生了“另类事实”等网络热词，目前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短期内恐怕难以了结。

二是社交媒体平台上假新闻泛滥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遏制。本月初，“脸书”首次针对明显缺乏事实或脱离实际的新闻报道推出“争议性”警示标签；此前，脸书和谷歌都宣布封杀假新闻网站的广告业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则宣布苹果正在开发一套工具来帮助用户自行标记和过滤假新闻，并呼吁科技公司联合构建能够屏蔽并清理虚假消息的工具。不过，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打假”，目前只开了个头，路漫漫其修远兮。

假新闻的危害，毋庸赘言。正如库克所言：“假新闻正在杀死人们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假新闻却也恰恰源于人们的思想。因此，遏制假新闻，远不止是科技公司的事情，也不可能仅靠科技手段解决。

记者这一行，某些时候很像司机，工作的年头愈长，戒惧之心愈盛。原因无他，常在河边走，很难不湿鞋。新闻有时效要求，在没有弹性的时间段里追求准确的事实表达，殊非易事。但即便真相永远是迷雾重重的罗生门，却也不妨碍不断向它靠近，不断清除雾障。

假新闻愈多，真相愈加珍贵。在“后真相”时代，媒体如何呈现真相，这是值得每一个新闻记者严肃思考和回答的问题。